

权力与特权：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GERHARD E. LENSKI

[美] 格尔哈特·伦斯基 / 著

关信平 陈宗显 谢晋宇 / 译

社会分层的理论

General explanations of those varieties of inequality which have decisive consequences for observable events are still in demand. But whoever embarks on the search will find Lenski's imaginative and substantial work an indispensable guide.

—Ralf Dahrendorf,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 far-ranging and profound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human inequality as well as into the found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 . . In a tour de force of sweeping scholarship Lenski guides us through the centuries to the most remote corners of the earth. . . . A masterpiece of comparative social analysis.

—Heinz Eulau,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GERHARD E. LENSKI

[美] 格尔哈特·伦斯基 / 著

关信平 陈宗显 谢晋宇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 / (美) 格尔哈特·伦斯基 (Gerhard E. Lenski) 著；关信平，陈宗显，谢晋宇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

书名原文：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SBN 978 - 7 - 5201 - 1217 - 8

I. ①权… II. ①格… ②关… ③陈… ④谢… III. ①社会阶层 - 研究 IV. ①D0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9919 号

权力与特权

——社会分层的理论

著 者 / [美] 格尔哈特·伦斯基 (Gerhard E. Lenski)
译 者 / 关信平 陈宗显 谢晋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 / 周方茹 陈曦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 (010) 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20.5 字 数：478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217 - 8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3 - 2544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让我们



一起追寻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by

Gerhard E. Lenski

Copyright:©1984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UNC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 .

2017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ASS

All rights reserved.

1988 年版中译本序

本书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格尔哈特·E. 伦斯基（Gerhard E. Lenski）的一本代表作。本书英文版首次出版于 1966 年，此中译本译自该书的 1984 年英文新版。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几千年来，学者们坚持不懈地苦苦探索着社会不平等的本质、原因和后果，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结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学说。而到了现代，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结构前所未有的复杂化，使得社会分层的问题更加尖锐、更加急迫地摆在了社会科学家的前面。由于社会学的创立和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 19 世纪的社会科学家的努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入了科学的层次。进入 20 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更加复杂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并引起了许多严重困扰着人类的社会问题，这就迫使社会科学家——首先是社会学家——不得不将它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来加以对付。因此，在现在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社会学中，社会分层都是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我国目前正进行着一场深入的改革运动，并经历着技术、生产力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急剧变化。这必然要导致整个社会

结构的明显变化，能否有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能否随时注意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将是决定社会系统能否良性运转的一个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改革能否全面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我国社会学界已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已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为了促进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发展，我们翻译了这本在美国社会学界（特别是其社会分层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著作，以求他山之石之借鉴。

本书作者毕竟是西方社会学家，其书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肯定会有错误或不适合于我国情况之处，望读者明鉴。另外，由于译者水平所限，书中漏错难免，也望大家不吝赐教。

本书各章的译者如下：

关信平（1984年英文平装版序，序言，第一、二、三、四、十、十一、十二、十三章），陈宗显（第五、六、七章），谢晋宇（第八、九章）。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和领导给予了我们支持和鼓励，“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编委会和浙江人民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翻译出版条件，在此一并致谢。

关信平

1987年10月

1984 年英文平装版序

vii

自 20 年前《权力与特权》一书写成以来，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又发生了许多变化。人们积累并分析了大量的新资料，引入了更为复杂的定量分析技术。同时，理论的视野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进展，值此新平装版出版之际，我们有必要问一下，从过去发生的变化来看，《权力与特权》一书所提出的理论遭遇如何。

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不能自称一个公正的观察者。我也不能自称熟悉过去 20 年中所有相应的工作。然而，就我所能判断的而言，在第二、三、四章和第十三章中提出的一般理论，以及从第五章到第十二章所提出的各种专门的理论迄今为止都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当然，如果我今天要重写此书的话，可能要加进一些新材料，并且可能要改变一些细节之处，但是，我还没有见到任何东西能使我认为原书的基本理论是不健全的。在我看来，第 458 页*上阐明的在各个常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本质上仍是正确的。并且，从这较为一般化的理论中所推出的各种特定的理论也是如此。

* 此为英文版页码，对应本书页边码。——编者注

viii 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自我夸耀的行为，但我相信，它是我在提出理论时采用综合方法论的一个结果。我一方面将理论建立在他人所铺垫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理论建构中把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相结合，我以这些方式将风险缩减到了最低程度，并避免了许多易犯的错误。

每一个社会分层理论都会遇到的中心问题是：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就此问题而言，过去 20 年中最重要的发展是，关于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料更容易得到了。这些社会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是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的试验基地。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在未受到任何挑战的情形下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种制度结构，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实验。这些实验的目的是要摧毁历史上的不平等模式，并取而代之地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那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受苏联控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也进行了相似的实验。没有哪个以严肃的态度去研究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者会忽略这些实验，或者不去深思它们的后果。

不幸的是，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对这些事情高度保密，使得甚至是关于这些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最基本信息都几乎无法获得。革命后不久，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就被取缔了。在漫长的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急剧恶化，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得到可靠的信息（Inkeles, 1950）。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关于苏联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最好的信息来源，都只是逃亡者的报告（Inkeles 和 Bauer, 1959）。

在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这一情况慢慢开始改善了。对小说家的限制逐渐放松了，到了 1956 年，波兰的一些社会学

家，如一直被软禁在家的斯坦尼斯劳·奥索夫斯基（Stanislaw Ossowski），也再度获准从事教学、写作和研究。在1962~1965年我写作《权力与特权》期间，相关材料的流动开始加速。一些小说，如弗拉基米尔·杜丁契夫（Vladimir Dudintsev）的《不仅单靠面包》（*Not by Bread Alone*, 1957），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伊万·邓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1963），以及费多·阿布拉莫夫（Fedor Abramov）的《新生活》（*The New Life*, 1963）提供了比以前深入得多的苏联生活细节。波兰社会学家们〔如斯蒂芬·诺瓦克（Stephan Nowak）、米查尔·波霍斯基（Michal Pohoski）、亚当·萨拉帕塔（Adam Sarapat）和维罗兹米尔茨·维索罗夫斯基（Wlodzimierz Wesolowski）〕的书和文章率先提供了关于一个苏联模式社会分层问题的系统的和定量的资料。

自6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层的信息细流转为了一股洪流。在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期间，波兰社会学家享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波兰社会学家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通过许许多多的调查和其他研究，他们探索了（社会）流动的模式、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对精英的态度、关于社会平等的信仰，以及许多其他主题。在这一期间，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学家们加入到这种努力之中，在有一小段时间中，捷克的社会学家也有参与。

由于他们以及其他一些记者和小说家的努力，我们今天比20年前更多地知道了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伟大的社会实验。更可喜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社会中建立政权20年以后，我们有更好的机会去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创新在年轻一代身上所产生的效果，而这些年轻一代的早期社会化是在一种

没有受到过资本主义或封建秩序影响的社会中进行的。

也许，从这些实验中能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人的本性似乎并不是像马克思和启蒙运动以来许多社会理论家所想象的那样容易改变，那样容易摆脱增进自我利益的内在倾向。塑造将社会需要放在个人需要和愿望之上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其结果是令人非常失望的。道德刺激已被证明比不上物质刺激。马克思主义的精英者们被迫——或者已经选择了去创建一种在许多方面都明显类似于非马克思主义工业社会中的职业分层体制。

在这一体制中，如同在其他体制中一样，权力的拥有者享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人所享受不到的特权（Matthews, 1978）。一个有影响的波兰社会学家指出，在这一体制中：

工人仍是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改变工人同机器的关系，也没有改变他们在工厂中的地位。……他与机器的关系和与工作组织系统的关系要求他服从工厂领班和工厂管理。他按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领取工资。并且，他必须服从工作纪律的原则和规定。（Szczepanski, 1970, 第 125 页）

根据最近一份对职业声望的研究，在苏联体制和美国体制之间有 .79 的相关（Treiman, 1977, 表 4）。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比苏联体制和波兰体制之间的相关还要稍大一些。

这些例子并不是孤立的。波兰社会学家的其他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波兰）存在一种双重市场体制。这与美国社会学家最近在美国发现的双重市场体制明显相似。一个在分层问题上有影响的波兰研究者解释道：

经济当中新的、生产力水平高的和重要的部门（如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通常都是与这些部门中较高的收入联系在一起。因此，即使在资历和工作复杂性上完全一样，一名在纺织厂或食品厂工作的电工所挣的钱也会少于一名在铸造厂或精炼厂工作的电工。（Wesolowski, 1979, 第 126 页）

x

最后，应该看到，最近一个关于波兰社会中收入差异原因的研究指出，这种差异用工人的性别差异来解释比用其他单个因素来解释更好一些（Pohoski, 1978, 也可见于 Swafford 1978 年关于苏联社会中妇女收入的研究）。几乎可以肯定，研究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专家日趋达成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最好是把这些社会也视为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把它看成按其自我标榜的某种新的和独特的社会类型（Jones, 1983）。

所有这些并不是要说马克思主义精英在东欧所进行的实验一无所获。我在别处提到过（Lenski, 1978），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在将经济不平等的程度降到非马克思主义工业社会中的水平以下这一点上似乎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程度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看起来似乎只有靠政治上的压制手段才能维持对经济不平等的严格限制。回顾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讨论，以及第二、三、四章和第十三章中关于一般理论的论述，我发现根据自 60 年代中期以来从东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学到的东西，我几乎没有需要什么改变的内容。

我可以做的一个具有理论重要性的修改可能是，补充讨论关于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存

的各种方式，以及如何用这三种成分的不同混合体去解释各个工业社会的差异性。我在别处曾指出（Lenski, 1984），在资本主义子系统中，指导原则是“按财（产）分配”；在社会主义子系统中，指导原则是“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是“按需分配”。这三种原则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都发挥作用。资本收益、股息、房地租、利润和资本家的红利按财产所有权而分配；工资、年薪、佣金则作为对工作表现的报酬而分配；福利支出、食品券、住宅供热支出、失业补贴、残疾人福利、医疗补助以及收入中转化为社会保障和对老人的医疗照顾的部分，还有免费的公共教育，免费进入公园、博物馆和其他公共场所，这些都是按照需要而提供的。从最近的政府资料中判断，美国国民收入中近 20% 是作为对财产所有的报酬而分配的，70% 作为工作报酬，10% 是按照需要而提供的。

在大多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几乎都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但全部人口中有一小部分人对这些财产行使着有效的控制，并常常运用这种控制去谋取私利。实际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这些社会，指责它们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xi（Cliff, 1974; Sweezy 和 Bettelheim, 1971）。总之，这是为什么东欧的社会分层系统与所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层系统的差别总不如他们所想要做到的那么大的原因之一。我相信，直截了当地承认在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中都共同存在这些分配原则，我们就会更接近于解释工业社会的这两个子类之间的相似性为何会存在表面上矛盾的现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分的相对强度上，各工业社会之间的差异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与各农业社会之间由统治者和执政阶级的相对力量所造成的差异相比较。在这两种情

况下，这些差异都说明了在一组重要的社会里，分配制度的变量中哪些方面看上去最为重要。

如果谁想要了解关于东欧社会分层的更详细和更新颖的观点，可以阅读许多关于这一主题的精彩论著，包括梅尔温·马修斯（Mervyn Matthews）的《苏维埃俄国的阶级和社会》（*Class and Society in Soviet Russia*, 1972）和《苏联国内的特权：共产主义条件下精英的生活方式研究》（*Privilege in the Soviet Union: A Study of Elite Life-style Under Communism*, 1978）；沃尔特·康纳（Walter Connor）的《社会主义、政治和平等：东欧和苏联的等级及变迁》（*Socialism, Politics, and Equality: Hierarchy and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USSR*, 1979）；大卫·莱恩（David Lane）的《社会不平等的结束？在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地位和权力》（*The End of Social Inequality? Class, Status and Power Under State Socialism*, 1982）。更为通俗化的著作有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的《俄国人》（*The Russians*, 1976）。关于东欧人自己的角度和观点，可参见诸如安德烈·阿玛尔里克（Andrei Amalrik）的《向西伯利亚的不情愿的旅行》（*Involuntary Journey to Siberia*, 1970）；罗伊·梅德韦杰夫（Roy Medvedev）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1972），维罗兹米尔茨·维索罗夫斯基（Włodzimierz Wesolowski）的《阶级、阶层和权力》（*Class, Strata and Power*, 1979）等。

如果我今天是在重写《权力与特权》一书，那我还将会加上关于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一章。这一章会有两个中心内容：一是这些社会在全球分层体系中的位置；二是这些社会自身内部的不平等体系。

在过去 20 年中，社会学理论中较为重要的发展之一，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的形成（1974，1980）。在由马克思、列宁和许多提倡依附理论的拉丁美洲学者所奠定的基础上，沃勒斯坦构建了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他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和贫穷看成第一世界的发达和富裕的必然后果，将世界上各个国家都看成一个全球分层系统中的参与者。

xii 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早在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就开始形成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多年来，它一直逐渐地蔓延，到现在，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由资本主义竞争原则所控制的单一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欧洲、北美、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一小部分国家控制了大多数的关键性资源，因而享有大多数的利益。在相对立的另一端，大多数的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许多的亚洲国家却只控制了很少的资源，并受第一类国家的剥削。在这两极之间，还有第三类国家，主要是东亚，但在其他地区也有。这些国家的境况比第二类要优越些，却远不如第一类。沃勒斯坦和其他一些人把这几类社会分别称作中心、边缘和半边缘。它们在世界分层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与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或新中产阶级的角色和地位相对应。

没有哪一个现代世界的观察者能够否认现代世界经济以及它所带来的分层系统的存在。另外，沃勒斯坦本人也注意到了，过去 500 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然而，他认为（Wallerstein, 1974, 第 16 页），它是第一个没有发展到政治控制的世界经济。

虽然我并不否认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但我将比沃勒斯

坦更加强强调，各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已是五千多年以来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甚至自第一批社会将其首要的维生手段从狩猎和采集转化到园耕时，就表现出各社会之间潜在的不平等了。接着，没过多长时间，这种可能性就转化为现实了。一些社会开始实施以牺牲邻国为代价而增进自身利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行动。简言之，我认为，各个社会之间的不平等的最终根源是技术进步，而不是更晚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有些人也许认为这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区分，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即使像沃勒斯坦所期望会发生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被一场全球性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要指望这会消除各社会之间的不平等，也是想得太天真了。如我们在俄国和中国之间，中国和越南之间，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斗争中，以及俄国同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或越南与其卫星国之间的支配关系上所看到的那样，没有理由指望社会主义社会之间会比其内部社会盛行更多的平等与公正。因此，一个成功的全球社会主义革命也许会改变各社会之间现存不平等制度的特点，但我们不应当指望它会彻底消除各个社会之间的不平等。

假如要分析全球的不平等系统，就得改变我对现行制度解释中强调的重点。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如 Chase-Dunn, 1975; Rubinson, 1976）的观点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各个国家的地位完全或至少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转决定的。我却认为，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其中起作用，甚至是更加重要的作用。例如，最近的研究（Lenski 和 Nolan, 1984）表明，现代社会的技术和经济传统比各个社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多地解释了在社会发展上和在最近的经济增长率上的差异。那些在与现代工业社会接触前实行犁耕农

业的第三世界国家，比那些接触前使用锄头和掘棍的园耕技术的社会发展得更为成功。

按照《权力与特权》一书所提出的，以及后来在《人类社会》（*Human Societies*）一书的各版本（1974，1978，1982）中所扩展了的理论来看，这几乎一点儿也不会让人感到惊奇。犁耕农业比园耕技术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它使农业社会可能拥有更多的剩余产品。这就使得在与工业社会真正接触以前，有可能极大地促进劳动分工和更加依赖于货币市场和现金经济，并且有可能使文化水平有更大的发展，同时强化国家和国家官僚机构。结果，与园耕传统的第三世界社会相比，具有犁耕农业传统的现代第三世界社会在进入 20 世纪时，带来了更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资源。

这两类社会在地理上是分开的，这一点也不是偶然的巧合（Lenski 和 Nolan，1984）。在世界上的温带地区，大多数园耕社会在很早以前就被农业社会取代了。然而，在大部分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种变迁在发展起现代工业之前都没有可能发生。正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指出（1976），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通常由于大量成群的和多种多样的微小的侵蚀性生物（细菌和病毒）的存在，损伤了人口的生命力，并杀死了犁耕农业的生产所依赖的牛和马，并且由于土壤贫瘠和更严重的除草问题，热带和亚热带社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Farmer，1968；Megger，1954；Watters，1960）。像地中海和北海这样的水路在现代交通工具发明以前曾如此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商业的发展，而东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却因缺少这种可以航行的河流和大规模的水路而发展受阻。

最近的研究（Nolan，1983）还指出，人口模式上的差异